

【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

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视角下的 君士坦丁堡建设初探

董晓佳

提 要: 君士坦丁堡曾是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 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奠基为帝国的首都。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众敌环伺的危局以及君士坦丁堡所处的战略位置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确定离开罗马、在东地中海建立新首都之时首要考虑的因素, 而其选址标准在本质上根植于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逻辑之中, 君士坦丁一世的个人作用有其地位, 但不是根本原因。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后, 帝国各地资源倾注于此, 与此同时,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 并成为东部地中海世界的新中心。

关键词: 君士坦丁堡; 晚期罗马帝国; 防御体系; 地中海世界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今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 作为拜占庭 (东罗马) 帝国的千年首都, 曾是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中心, 同时又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它是“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城市”,¹ 如同罗马城曾是“世界的舞台”一样。² 晚期罗马或早期拜占庭帝国史家如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of Caesarea)、尤特罗匹乌斯 (Eutropius)、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特斯 (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索佐门 (Sozomen)、菲洛斯特吉乌斯 (Philostorgius)、左西莫斯 (Zosimus)、约翰·马拉拉斯 (John Malalas) 等人的作品以及匿名作者的《复活节编年史》 (Chronicon Paschale) 等均对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做过详略不等的叙述; 同时, 鉴于君士坦丁堡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学界对其城市建设与发展历程给予高度关注, 研究成果之多可谓汗牛充栋。³

* 本文是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文献《塞奥多西法典》翻译与研究” (项目批号: 14XSS003) 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度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研究”的成果。

¹ Marcus Rautman, *Daily Lif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6, p. 61.

² Peter Arnott, *The Byzantines and their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66.

³ 与君士坦丁堡有关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现仅将当代学者中以君士坦丁堡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略举数例如下。就君士坦丁堡的宏观发展而言, 迈克尔·麦克拉甘的《君士坦丁堡》 (Michael Maclagan, *The City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8) 对君士坦丁堡的千年发展进行了总结; 西里尔·曼戈的《拜占庭建筑》是关于拜占庭帝国建筑的综述性著作, 其中也包含了与君士坦丁堡建设有关的论述 ([美] 西里尔·曼戈著, 张本慎等译: 《拜占庭建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年); 强纳森·哈里斯的《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首都》 (Jonathan Harris, *Constantinople: The Capital of Byzantium*,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则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就君士坦丁堡内建筑的个案分析而言, 西里尔·曼戈就君士坦丁堡内的皇帝雕像、城门、某个公共浴室、某一教堂等均有考证性论文 (Cyril Mango, *Studies on Constantinople*, Aldershot: Variorum, 1993); 贝尔格尔就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与公共空间进行了研究 (Albrecht Berger, “Streets and Public Spaces in Constantinople,”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54 [2000], pp. 161-172); 等等。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建设与相关问题研究, 国内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 陈志强: 《拜占庭帝国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第92—99页, 第146—147页, 第166—167页; 徐家玲: 《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45—51页, 第249—252页; 袁波、雷大川: 《论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廷》,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1期; 武鹏: 《论拜占庭帝国早期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的形成》, 《历史教学》, 2013年第10期; 等等。

对于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I, 306—337年在位) 修建君士坦丁堡的原因, 古今史家各有自己的解释。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的非基督徒史家左西莫斯认为他是为了逃避罗马元老院与罗马居民的憎恨。¹信奉基督教的史家从其信仰出发, 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与建设过程同上帝的干预或启示密切联系。²现代学者则大多认为君士坦丁堡之修建在于君士坦丁一世看中了此处优越的战略位置。³

君士坦丁堡的战略位置确实是君士坦丁一世为新都选址时的首要考虑因素, 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角度的阐述。布克哈特认为是由于君士坦丁一世要寻找“一个不受传统羁绊的中立点”。⁴也有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一世的“这一举动旨在满足一种接近新的帝国中心的需要”, 是为了靠近新的政治、经济与宗教中心。⁵还有史家则将之归功于君士坦丁一世个人的才华。⁶以上观点无论是强调君士坦丁一世出于宗教、文化因素而迁都, 或是出于经济、政治等原因而建设君士坦丁堡, 实质上均或明或暗地认为君士坦丁一世个人的独到眼光抑或才干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 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 可以看出, 君士坦丁堡的建设虽然不能排除君士坦丁一世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但他的决定并未超越于其时代环境所提供的选择之上, 也并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孤立事件, 在本质上乃是长期危机状态之下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自然发展与组成部分之一。一定程度上, 或可将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重建视为在危机时代对于现有军事与相关资源在帝国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而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则是这种重新配置的手段之一。但是, 君士坦丁堡一旦落成, 它就由于其特殊地位而得以迅速发展繁荣, 从而对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重建

在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早期历史上, 军队主要用于对外扩张, 而罗马军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在行军时会建设设防营地 (marching camp),⁷“军团保持移动, 不过是以缓慢而有次序的进度, 建设它自己的要塞并修建它自己的交通路线”。⁸到公元1世纪, 帝国已经到达其扩张极限, 罗马军队对外的任务也转为以防御为主。从公元1世纪后期到塞维鲁王朝时期, 罗马帝国统治者几乎把整个帝国完全变成了遍布防御和据点的军事堡垒。⁹原先罗马军团行军途中所修建的设防营地, 此时为固定的永久要塞所代替。爱德华·卢特维克称之为“阻断防御” (preclusive defense), 这类边境据点一般具有瞭望哨、前哨

¹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by Ronald T. Ridley, Canberra: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2. 29. 5-2. 30. 1, p. 37.

² 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Averil Cameron and Stuart G. H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140; Philostorgius, *Church History*, trans. by Philip R. Amidon, S. J.,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2. 9, p. 24;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Chester D. Hartranft,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II. 3, pp. 259-260;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37.

³ 公元前7世纪, 古希腊人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卡尔西顿城, 后又在卡尔西顿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新城, 命名为拜占庭 (参见Jonathan Harris, *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Byzantium*, p. 24)。此后许多军事家与古典作家都注意到拜占庭城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有其重要战略意义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 第92—93页)。关于君士坦丁一世建设新都时的战略需求, 也可参见[英]迈克尔·格兰特著, 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08页; [美]詹姆斯·奥唐奈著, 夏洞奇、康凯、宋可即译:《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年, 第23页。

⁴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 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 第282页。

⁵ [法]Paul Alain Ducellier著, 刘增泉译:《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世界》,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95年, 第25页。

⁶ [美]詹姆斯·奥唐奈著, 夏洞奇、康凯、宋可即译:《新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171页。

⁷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5.

⁸ [英]迈克尔·曼著, 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374页。

⁹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p. 57.

阵地、通讯联系、保护交通、军队基地的作用。¹阿瑟·菲瑞尔对此战略的总结是：军团士兵部署于遍布于边界线上的要塞中，另一部分士兵沿着边界防御设施进行巡逻。²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在不列颠建设的从泰恩河（Tyne）到索尔韦湾（Solway）的“哈德良长城”就是这一防御政策的产物；³此后，皇帝安敦尼（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建设的从福斯湾（Forth）到克莱德河（Clyde）的“安敦尼长城”也体现了相同的防御指导思想。⁴

到3世纪危机时期，当帝国各地军队陷于内战、帝国边境所受到的军事压力也日益增大之时，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人力与物力基础，帝国原先的防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3世纪危机结束后，罗马帝国进入晚期发展阶段，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重新统一帝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帝国仍控制着西起不列颠、东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疆域，而莱茵河畔的法兰克人（Franks）、阿拉曼尼人（Alemanni），多瑙河畔的哥特人（Goths）、匈人（Huns）以及帝国东部所面对的阿拉伯人、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n）等则不断持续考验着帝国的防御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外敌，晚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构建帝国防御体系。

经过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的军事改革，帝国军队分为野战部队（comitatenses）与边防部队（limitanei）两个部分，野战部队平日驻扎于帝国内部，是由皇帝控制的机动力量，一旦某处边关有警，野战部队就迅速前去增援，但边境据点并未失去其固有作用，这些据点现在由战斗力较弱的边防部队守卫，与野战部队一起成为帝国新的“深度防御”（defense-in-depth）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种体系下，敌人穿越边界并不意味着帝国防御的失败，而正是防御的开始，进入帝国疆土的敌人不仅要面对迅速赶到的野战部队的攻势，也受到自己身后或附近的大小设防城市与边境据点的威胁。⁵该体系中的边境据点除了担负着保护驻地安全与确保地区之间联系、阻碍敌人入侵的任务外，还承担着补给帝国参战军队、为野战部队提供前进基地或保障野

战部队安全撤退的职责。⁶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虽然有时候会放弃军事价值小于维持成本的边境据点，但在总体上却从未放弃对边境据点的建设和维护。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据点“通常比之前所建堡垒更为坚固，拥有更厚的带防御塔的墙垣”。⁷

二、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中城市的作用

相对于在作战中提供辅助与后勤功能的边境据点，在“深度防御”体系中，城市的地位更为重要。

首先，城市一般是某一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在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过程中，边境据点主要是围绕着城市或在连接设防城市的交通要道沿线建设的。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对岸建立了迪维提亚—戴乌特兹堡（Divitia-Deutz），并以桥梁联系两地；⁸为保护从特里尔（Trier）到科隆与萨尔河谷（Saar Valley）的通道以及自通格雷斯（Tongres）到尼基梅根（Nijmegen）、自奥格斯堡（Augsburg）到肯普滕（Kempten）之间的道路，君士坦丁一世修建了大量堡垒。⁹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364—375年在位）则为加强通格雷斯与尼基梅根之间的交通安全兴建了库伊基克（Cuijk）

¹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pp. 66-67.

² Arthur Ferri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ilitary Explanation*,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6, p. 25.

³ [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第235页。

⁴ [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第236页。

⁵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p. 132.

⁶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 pp. 132-134.

⁷ Pat Southern and Karen Ramsey Dixon, *The Late Roman Arm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3.

⁸ Harald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Centuries A. D.,"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61 (1971), p. 181.

⁹ Harald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Centuries A. D.," p. 188.

城堡。¹在帝国东部地区,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况:在与波斯帝国的战争中,尼西比斯(Nisibis)城曾是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在东部地区的坚强支柱,²4世纪史家阿米安声称尼西比斯的战略位置以及城墙是罗马人的坚强屏障,“若非它的抵抗,整个东方早已落入波斯人的手中”。³正因如此,波斯人才在4世纪3次围攻尼西比斯。⁴以尼西比斯为中心共有15座堡垒据点,从而构成一个地区性防御体系,皇帝朱利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远征波斯战死沙场后,为摆脱困境,继位的约维安(Jovian, 363—364年在位)被迫在和约中同意将尼西比斯与其周边的15座要塞割让给波斯人,这就对东部地区的战略态势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⁵此后,为了重建受到削弱的东部帝国防御体系,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79—395年在位)于公元383年把雷萨纳(Resaina)的建制从村庄升级为城市,⁶同时将安条克以北40公里的基恩达洛斯(Gindaros)与安条克以东将近50公里的利塔尔格昂(Lytargon)建为堡垒,⁷以巩固重要城市安条克的防御。

其次,城市及其附近是精锐部队的主要驻地。戴克里先时代,全部野战部队分为4个兵团,每位皇帝率领1个兵团。⁸君士坦丁一世进一步加强野战部队的力量。据左西莫斯记载,“君士坦丁把大部分军队从边防线上调离,并让他们驻扎于不需要防御的城市中”。⁹作为一名对君士坦丁一世心怀不满的非基督徒史家,左西莫斯企图以此作为证据攻击君士坦丁一世,认为他的行动是“帝国现今毁灭的起源与开端”;¹⁰而现代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一世是为了加强野战部队的实力而从边防部队中抽调最精良的部队,并把野战部队“变成永久性建制,这支部队从驻扎边境的军队中抽调构成,集中在距边境不远处的城市。这支部队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其优点在于对付入侵之敌时可快速大量集结。¹¹在废除近卫军的同时,君士坦丁一世建立了7支各由500人组成的宫廷卫队(scholae palatinae),将此3500人的精锐部队并入野战部队,部队的日常管理由执事长官负责,直接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并听命于皇帝个人。¹²除非皇帝

率军出征,宫廷卫队在平时自然也是随皇帝驻扎于城市中。由此可见,作为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晚期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成为帝国军队精锐之师的驻扎地。

最后,城市是帝国军队进行防御、反击与进攻的基地。公元353年,由于伊科尼姆(Iconium)当地居民处死了一些小亚细亚山民伊苏里亚人(Isaurians),导致后者暴乱。¹³伊苏里亚人从山地出发进攻沿海地区,攻击停泊在那里的船舶,杀害水手,以致船只纷纷逃到塞浦路斯北岸;与此同时,伊苏里亚人阻断交通,洗劫行省居民以及旅行者,袭击行省中的各个城市,利用山区地

¹ Harald Von Petrikovits, “Fortifications in the North-We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fth Centuries A. D.,” pp. 188-189.

² 该城曾于3世纪危机期间落入萨珊波斯手中(Fergus Millar,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0),直至戴克里先时代才为罗马军队所收复(Fergus Millar,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pp. 177-178)。

³ Ammianus Marcellinus, *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Vol. 2, trans. by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 8. 14, p. 545.

⁴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38.

⁵ Philostorgius, *Church History*, 8. 1, p. 111; Zosimus, *New History*, 3. 31. 1, p. 66.

⁶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and Roger Scott with Brian Croke, Jenny Ferber, Simon Franklin, Alan James, Douglas Kelly, Ann Moffatt, Ann Nixon, Melbourn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6, 13. 39, p. 187.

⁷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13. 41, p. 188; Geoffrey Greatrex and Samuel N. C. 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s,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6.

⁸ [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第299页。

⁹ Zosimus, *New History*, 2. 34. 1, p. 39.

¹⁰ Zosimus, *New History*, 2. 34. 2, p. 39.

¹¹ 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68—269页。

¹² Arthur E. R. Boak and James E. Dunlap, *Two Studies in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p. 23; 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8, p. 35 and 37.

¹³ Ammianus Marcellinus, *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Vol. 1, trans. by John C. 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 2. 1, p. 13.

形以避实击虚的战术与帝国军队作战,守卫塞琉西亚(Seleucia)的将军卡斯特里修斯(Castricius)在与伊苏里亚人的对阵中失败,被迫困守塞琉西亚城,最终当时主管东方事务的伽鲁斯(Gallus)命内贝里迪乌斯(Nebridius)领军解围,伊苏里亚人方收兵归乡。¹公元359年,伊苏里亚人再度发动大规模袭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337—361年在位)派遣劳里修斯(Lauricius)率军抵抗,²其基地也正是塞琉西亚城。安条克是一个更为著名的实例,该城长期以来成为帝国军队对波斯战争的基地:皇帝戈耳迪安三世(Gordian III, 238—244年在位)曾于公元243年率军从安条克出发进攻波斯;³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时代,与波斯的长期冲突令其时刻准备于危机时刻前往安条克坐镇。根据索克拉特斯的记载,在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从安条克来到君士坦丁堡,在解决了一次君士坦丁堡主教继任人选纠纷后,不久就又匆匆前往安条克;⁴公元359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再次火速前往安条克,据索克拉特斯说是皇帝得知波斯人正在准备另一场对罗马人的战争,⁵此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长期滞留在安条克,直至朱利安在高卢称帝才率军西归;⁶朱利安统一帝国后,为发动对波斯的战争,于362年来到安条克备战;⁷皇帝瓦伦斯(Valens, 364—378年在位)统治时期,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皇帝也是以安条克为战争基地的。⁸为了巩固安条克的防御,这座城市在塞奥多西一世在位时期得到扩建,他修建了一道新城墙以应对可能的威胁。⁹

正是由于在3世纪危机后帝国重建的防御体系是以城市为中心,因此城市的防御是否完备就关系到某一地区防御体系是否巩固,如是,在396年以塞奥多西一世的名义致东方大区长官凯撒里乌斯(Caesarius)的命令中,曾要求其辖下所有行省总督督促各自行省中所有城市修建新城墙或加固旧城墙。¹⁰在这种情况下,就整个帝国而言,皇帝所选择的驻跸城市及其建设就关系到更大范围内的防御体系的成败,这是由晚期罗马帝国内部政治发展与外部危机所决定的。一方面,皇权的持续强化是晚期罗马帝国内

部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晚期罗马帝国的外部危机需要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点保持强大的机动力量。出于保持对军队控制,并及时应对边境危机的需要,皇帝必须长期驻跸于这些战略位置重要的城市。因此,皇帝所在地既是帝国的行政中心,又是精锐部队的集中地,同时也必然成为防御体系的中心所在,一座都城的选址也就是在确定防御体系的真正核心所在地。

三、君士坦丁堡的建设是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自然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四帝共治制时期的皇帝驻跸地点的安排为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埋下伏笔。戴克里先统治罗马帝国期间,调整并改组帝国行政区划,建立“四头政治”: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us)的称号是“奥古斯都”,前者以尼科米底(Nicomedia)为都,后者以米兰为驻地,分掌帝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在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之下分设两名称号为“凯撒”的副手,分别为伽勒里乌斯(Galerius)与君士坦丁

¹ Ammianus Marcellinus, *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Vol. 1, 14. 2. 2-20, pp. 13-23.

² Ammianus Marcellinus, *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Vol. 1, 19. 13. 1-2, p. 545.

³ Beate Dignas and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Neighbours and Riv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22.

⁴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 by A. C. Zeno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II. 7, p. 38.

⁵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44, p. 73;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V. 28, p. 323; Timothy Venning ed., *A Chronolo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9.

⁶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47, p. 75.

⁷ Zosimus, *New History*, 3. 11, p. 56; G. W. Bowersock, *Julian the Apo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5.

⁸ Zosimus, *New History*, 4. 13. 1-2, pp. 75-76.

⁹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13. 40, p. 188.

¹⁰ Clyde Pharr (tran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undian Co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15. 1. 34, p. 427.

一世之父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 (Constantius Chlorus), 他们分以西尔米乌姆 (Sirmium, 今塞尔维亚城市米特罗维察) 与特里尔为首府, 协助两位奥古斯都管理帝国。学者一般认为做出这种安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加强边境防御。¹ 实际上, 米兰位于意大利北部, 靠近阿尔卑斯山脉, 皇帝驻扎于此可以更有效地监控边境, 及时应对外患; 特里尔位于莱茵河畔, 是帝国莱茵河防线的核心所在; 尼科米底位于小亚细亚, 是帝国在东方的重要据点, 戴克里先在此便于监视波斯人的行动; 西尔米乌姆则是多瑙河沿岸军事要地, 是多瑙河下游地区重要交通节点,² 伽勒里乌斯在此可对多瑙河流域的防务问题做出迅速反应。这四座城市的共同特征在于: 首先, 它们与边境防线距离较近, 但又保持着一定距离; 其次, 各自所处的战略位置均便于针对某一方向的外敌进行防御或反击; 再次, 由于以皇帝为首的宫廷、行政机构与军队的进驻, 因此成为协调与统领所在地区防务的中心。四帝共治制下四位皇帝与副皇帝驻地的选择既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预示了君士坦丁堡的选址、建设与发展。

由于406年发生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等越过莱茵河这一标志性事件以及476西罗马帝国政权的倾覆, 这就令人产生一种帝国西部地区所遭受的外患较之东部更为严重的感觉。但是, 自3世纪危机至君士坦丁堡落成期间这一特定时间段内, 东部地区所面对的外来压力即使不比西部地区更大, 至少也与其相当。在此期间, 莱茵河流域是西部地区承受压力的主要区域, 而主要的外患则是阿拉曼尼人 (Alamanni) 与法兰克人 (Franks)。阿拉曼尼人在公元213年曾与罗马皇帝卡拉卡拉 (Caracalla, 198—217年在位) 在美因河 (Main) 附近交战。³ 皇帝伽利恩努斯 (Gallienus, 253—268年在位) 时代, 阿拉曼尼人曾经入侵高卢与意大利。⁴ 戴克里先时代, 阿拉曼尼人与法兰克人联兵入侵 (或迁徙), 马克西米安与戴克里先在公元287年与288年先后两次击败阿拉曼尼人。⁵ 数年后,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在高卢击败了阿拉曼尼人的一次

入侵, 尤特罗匹乌斯宣称阿拉曼尼人战死者达6万之众。⁶ 此后, 直到4世纪50年代中期, 除君士坦丁二世 (Constantine II, 337—340年在位) 曾与其交战外, 阿拉曼尼人与帝国之间基本保持着和平。⁷ 阿拉曼尼人主要聚居地的北部属于莱茵河上游地区, 那里居住着法兰克人,⁸ 他们时常与阿拉曼尼人一起行动。公元240年左右的一份资料中曾提及过法兰克人。⁹ 皇帝普罗布斯曾经于公元277至278年大败法兰克人。¹⁰

与主要集中于莱茵河防线的帝国西部战事相比, 同一时期的东部地区则在多瑙河中下游流域与两河流域同时受到威胁。日耳曼人构成了对多瑙河防线的主要威胁: 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 (Marc Aurelianus, 161—180年在位) 曾在此与马科曼尼人 (Marcomanni) 苦战;¹¹ 3世纪时, 哥特人频繁入侵色雷斯、莫西亚等地区。¹²

¹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 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p. 41;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 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 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第27、37页; [法]菲迪南·罗特著, 王春侠、曹明玉译, 李晓东审校:《古代世界的终结》,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 第12—13页; [英]迈克尔·格兰特著, 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 第297页。

² 冯定雄:《罗马道路与罗马社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第88页。

³ John F. Drinkwater, *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 (Caracalla to Clov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3.

⁴ Eutropius, *Abridgment of Roman History*, trans. by John Selby Watson,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86, IX. 8. (http://www.ccel.org/ccel/pearse/morefathers/files/eutropius_breviarium_2_text.htm)

⁵ John F. Drinkwater, *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 (Caracalla to Clovis)*, pp. 180-183.

⁶ Eutropius, *Abridgment of Roman History*, IX. 23.

⁷ John F. Drinkwater, *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 (Caracalla to Clovis)*, p. 200;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 5.

⁸ John Matthews, *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Duckworth, 1989, p. 307.

⁹ H. M. Gwatkin and J. P. Whitney eds.,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95.

¹⁰ Zosimus, *New History*, I. 68, p. 21.

¹¹ [英]迈克尔·曼著, 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 第388页。

¹² Jordane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trans.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Cambridge: Speculum Historiale,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60, XIII. 76- XVII. 100, pp. 72-79; Zosimus, *New History*, I. 23-35, pp. 8-11.

251年,皇帝戴西乌斯(Decius, 249—251年在位)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阵亡。¹虽然皇帝克劳狄(Marcus Aurelius Claudius, 268—270年在位)曾重创哥特人,但帝国政府还是于273年被迫允许他们在达吉亚行省定居。²

在两河流域,帝国遇到的敌人是组织完备的萨珊波斯。当罗马帝国于公元3世纪深陷危机之时,新兴的萨珊波斯开始对帝国东部边疆用兵,并于皇帝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235—238年在位)时期占据了尼西比斯与卡雷(Carrhae)。³之后,通过长达两年的围攻,于公元240年占领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据点哈特拉(Hatra),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于是在243年出征波斯;罗马军队在进军初期取得一些胜利,次年即在米斯克(Misik)战役中为萨珊波斯的沙普尔一世(Shapur I, 240—272年在位)所败,皇帝战死,后继者阿拉伯人腓力(Philip the Arab, 244—249年在位)不得不签订了对波斯人有利的和约。⁴该和约并未维持很长时间,萨珊波斯继续入侵罗马的东部行省,在战争中,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 253—260年在位)甚至成为俘虏。⁵直至戴克里先时代,萨珊波斯才遭遇重大失败。⁶

从以上史实来看,自马可·奥里略统治时期至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开始建设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段内,帝国在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显然更为严峻,东部不仅两面受敌,而且威胁的来源更为多样:既要防备“蛮族”的劫掠或是迁徙,又要面对与波斯帝国的争霸战争。这种严峻形势最为直观的外在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在东部地区的对外战争中有3位皇帝战死或被俘,而在西部则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显然,就当时而言,东部地区的防御更需要得到关注,这也正是四帝之首戴克里先选择位于东部的尼科米底为其都城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说四帝共治时期可以存在四座都城分别充当四个地区的防御体系中心的话,那么当帝国只剩下一位皇帝时,这位皇帝所在的城市就将成为整个帝国防御体系的核心,而根据对四帝共治时期都城选址特征的分析,这座唯一的都城就必须能够尽可能多地顾及各条防

线,并设立于帝国防御体系所受压力最大的区域。因此,当君士坦丁一世于324年击败最后一名与其争夺帝国最高统治权力的对手李锡尼后,当他的目光由统一帝国转向防御外敌时,首先考虑的便是在东部地区寻找一座适合充当防御体系核心的城市。这种思考体现于他的具体行动中:君士坦丁一世原先打算在西格乌姆(Sigeum)与伊利乌姆(Ilium)之间建设新都,并且已经开始修建城墙,后来他发现拜占庭城的位置更为适宜,于是改变了建城地点,在左西莫斯写作的时代,乘船途经赫勒斯滂(Hellespont)时还能见到未完工的新都遗迹。⁷除此之外,君士坦丁一世也曾考察过塞萨洛尼卡与卡尔西顿。⁸从其选址的犹豫不决与多次变化来看,很明显君士坦丁一世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有效监控多瑙河防线,同时也可以及时援助与波斯人对峙的东方大区军队的地点,以便此处能够成为帝国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防御体系核心。

尼科米底、安条克、卡尔西顿、塞萨洛尼卡、西尔米乌姆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都有各自的缺陷:由于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令每个皇帝负责一个地区的防御,因此可以选择位于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为自己的驻地,但是到君士坦丁一世统一帝国之后,尼科米底的位置显然就过于偏僻,君士坦丁一世若以尼科米底为都,显然难以迅速处理多瑙河防线以及帝国其他地区的军事问题;安条克与卡尔西顿具有与尼科米底类似的问题;塞萨洛尼卡与西尔米乌姆则距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前线较远。因此,这5座城市虽然可以成为地区性防御体系的中心,但都难以承担起东地中海地区防

¹ Jordane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XVII. 103-104, p. 80.

²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65—66页。

³ Fergus Millar,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p. 150.

⁴ Beate Dignas and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Neighbours and Rivals*, pp. 20-22.

⁵ Beate Dignas and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Neighbours and Rivals*, pp. 22-24.

⁶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 437.

⁷ Zosimus, *New History*, 2. 30. 1-2, p. 37.

⁸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283页。

御体系核心城市的地位。与它们相比,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拜占庭城所在位置能够满足防御体系自身发展的这一要求,君士坦丁一世的战略眼光则体现在他能够认识到防御体系重建自身的发展需要。

四、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对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影响

君士坦丁堡本是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要求与逻辑发展产物,但一旦落成,它的存在就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本质而言,君士坦丁堡的出现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为东部地区树立了足以与罗马相抗衡的新的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防御中心,并促进以其为首都的拜占庭帝国的成形。

索克拉特斯在提到君士坦丁一世建设君士坦丁堡时,声称君士坦丁一世“赐予它与罗马具有平等地位”。¹除了措辞稍有差别外,索佐门基本继承了索克拉特斯的观点。²在非洛斯特吉乌斯的《教会史》中,作者指出君士坦丁一世为君士坦丁堡提供的优惠政策令其成为与罗马的竞争对手。³左西莫斯称君士坦丁一世为寻找一个可与罗马相抗衡的城市而建设了君士坦丁堡。⁴

作为新都,君士坦丁堡的确在其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逐渐赶上了旧都罗马,但这也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并非如索克拉特斯与索佐门所言只是凭借君士坦丁一世一纸命令便大功告成的。君士坦丁堡地位的提高自有其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与罗马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相对降低相联系的。

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实质上已经岌岌可危:戴克里先作为全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选择尼科米底为都,从那里对帝国发号施令;戴克里先的西部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则以米兰为自己的宫廷驻地。戴克里先时代之后,随着新都君士坦丁堡的落成,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东部皇帝的首都,当帝国处于一个皇帝统治之下时,君士坦丁堡又是整个帝国的首都;而西部地区的皇帝们则先以米兰为都、后以

拉文纳为驻地。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朱利安、瓦伦斯、塞奥多西一世、阿尔卡迪乌斯与塞奥多西二世的首都均是君士坦丁堡;西部地区的首都先是米兰,到霍诺留担任西部皇帝时期,首都迁至拉文纳,此后拉文纳一直是西部帝国统治机构的中心。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由于皇帝们除了短暂造访之外,不再于罗马驻跸,罗马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传统地位,英国著名罗马史学者琼斯就此指出,“在晚期帝国时代,罗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中心并不比其他12个行政区的首府更具重要性”。⁵

罗马在帝国中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君士坦丁堡地位的上升,其直接原因是皇帝们不再将宫廷设于罗马而君士坦丁堡则成为皇帝宫廷的常驻地,其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当时的军事与经济环境:⁶君士坦丁堡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们的青睐,一方面是出于其优良的战略地位与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东部地区拥有比西部更为丰富的经济资源,而设都城在位于欧亚商路要冲的君士坦丁堡更便于政府有效利用东部的经济资源。除此之外,西部皇帝自霍诺留之后以拉文纳为都主要也是出于军事考虑:拉文纳位于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附近有沼泽为屏障,又可经由海上退却。⁷霍诺留以及随后的西部皇帝们之所以选择拉文纳这个有利于防御与撤退的海滨城市为其宫廷驻地,正是因为西部政府的军事力量因不断的外战与内乱日益减弱,皇帝们不得不选择一个较罗马与米兰更为安全的都城。随着皇帝们不再居住于罗马,罗马也就失去了其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因为在皇权不断加强的晚期罗马帝国时代,帝国政

¹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 16, p. 21.

²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3, p. 259.

³ Philostorgius, *Church History*, 2. 9, p. 25.

⁴ Zosimus, *New History*, 2. 30. 1, p. 37.

⁵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 I, p. 687.

⁶ [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⁷ [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第319页。

治生活就是围绕皇帝及其宫廷为中心展开的,皇帝及其宫廷所在之地就是帝国的首都与政治中心所在地,一旦皇帝选择居住于罗马之外,罗马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与此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作为皇帝常驻地的君士坦丁堡,其政治地位则在不断上升,这种上升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地位的上升。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设立了君士坦丁堡元老院,鼓励帝国东部地区的名门与高级官吏加入,¹而组成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这些东部地区贵族官吏或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则低于罗马元老院成员。²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在法律上并未获得与罗马元老院相等的地位。索佐门曾经声称君士坦丁一世不仅创立了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同时赋予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享有与罗马元老院相同的地位与特权。³索佐门之所以提出如此声明,其中原因可能与索克拉特斯声称是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享有同等地位相类似,欲将所有的功绩归于一位理想君主,又或是借用这位贤君明主的威望作为一种宣扬君士坦丁堡地位的工具。实际上,有学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君士坦丁一世建立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更接近于如安条克这样的地方首府的城市元老院。⁴

真正令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获得与一个帝国首都元老院相称地位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他主要采用了两项措施提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地位:第一项措施是根据居住地域分配元老归属。原先居住在东部地区的罗马元老院成员现在必须放弃罗马元老的身份,同时转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成员,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元老院成员的称号此时也统一为“辉煌者”(Clarissimus),这种做法令罗马元老院和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分别成为代表帝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社会上层成员的机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加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第二项措施则是从东部各个城市的市议会成员中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招募新成员,以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在帝国在东部的统治基础,其目的是通过增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来加强东部各地社会上层成员对首都政

府的向心力。⁵此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又通过公元357年至361年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规定了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并且授予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与罗马元老院以相同的地位与特权。⁶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大力提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地位的政策下,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规模迅速扩大,至4世纪中后期已从初建时的50人增长到约2000人。⁷虽然出于其悠久传统,罗马元老院的地位在如利巴尼乌斯(Libanius)这样的东部人眼中仍然高于君士坦丁堡元老院,⁸但是由于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与帝国官僚体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⁹同时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更接近权力的核心——皇帝及其宫廷,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在帝国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逐渐发挥着较罗马元老院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君士坦丁堡市政官(Prefect of Constantinople)一职的设立与地位的上升。除提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地位之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还于公元359年首次设立了君士坦丁堡市政官一职,首任市长为霍诺拉图斯(Honoratus),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的日常事务则是由一名同执政官(proconsul)管理。¹⁰在帝国官僚等级中,

¹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369页。

²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 185.

³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3, p. 259.

⁴ Deno John Geanakoplos,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87.

⁵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p. 187-188.

⁶ 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7; Deno John Geanakoplos,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p. 88;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 I, p. 688; [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著,陈志强译:《拜占廷帝国》,第29页。

⁷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 187.

⁸ Deno John Geanakoplos,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 p. 88.

⁹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p. 190-191.

¹⁰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41, p. 71;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 (trans.), *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

君士坦丁堡市政官的地位与罗马市政官平齐，仅次于大区长官。¹由此，罗马市政官也继罗马元老院之后失去了原先在帝国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由于君士坦丁堡市政官比罗马市政官更为接近皇帝，其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渐超过了罗马市政官。君士坦丁堡市政官的日常工作包括负责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范围内的市政建设、食物与饮水供应、城市卫生与消防、罪犯惩罚与监管、治安与秩序维护、工商业管理、商品物价、高等教育以及城内的司法审判。²除此以外，根据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361年5月3日颁布的法令，举凡比提尼亚、帕非拉格奥尼亚、吕底亚、赫勒斯滂、爱琴海诸岛、弗里基亚以及色雷斯等地区的上诉案件也均归君士坦丁堡市政官处理。³君士坦丁堡市政官从此获得了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地区的司法管辖权，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提高。

最后，君士坦丁堡政治地位上升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的提高。自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采取支持与保护政策后，基督教逐渐成为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居民的主流信仰。在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前，在各地教会中以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罗马教会与安条克教会、耶路撒冷为尊。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在其决议中的第6条教会法规中明确规定，根据古老的传统，亚历山大里亚牧首负责管辖埃及、利比亚与佩塔波利斯地区的教会，罗马主教与安条克牧首也都负责管理各自辖下教会，若无他们的同意，其下属教会所立主教即属无效。⁴君士坦丁堡建成后，随着君士坦丁堡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在381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决议中的第3条教会法规确定，“君士坦丁堡牧首应享有仅次于罗马主教的荣耀特权，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⁵最后，在451年举行的卡尔西顿会议上，根据会议决议中的第28条教会法规，君士坦丁堡教会最终获得了与罗马教会相等的地位，并负责管理亚细亚、本都、色雷斯以及蛮族中的教会。⁶

正如琼斯所言，“君士坦丁堡能得到非凡成长，其首要原因在于它成为了皇帝及其宫廷的所在地。君士坦丁堡城内居住着诸多宫廷大臣

以及他们手下的成千官员。君士坦丁堡是东方大区长官的驻地，而他管辖着帝国最富裕的5个行政区”。⁷简而言之，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帝国新兴的政治中心，因此自然得到以皇帝为首的帝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⁸同时作为皇帝常驻的

¹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XIII, *The Late Empire*, A. D. 337-425, p. 38.

²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374—375页。

³ Clyde Pharr (tran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undian Constitutions*, l. 6. 1, p. 17.

⁴ Henry R. Percival ed.,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Undivided Church: Their Canons and Dogmatic Decrees*, Grand Rapids, MI: Christian Classic Ethereal Library, p. 65. (该书为电子资源，网址为<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14.html>，可在该网址中下载PDF文件，所标注页码是电子资源中的页码，下同)

⁵ Henry R. Percival ed.,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Undivided Church: Their Canons and Dogmatic Decrees*, p. 376.

⁶ Henry R. Percival ed., *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Undivided Church: Their Canons and Dogmatic Decrees*, p. 570.

⁷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 I, p. 688.

⁸ 君士坦丁堡的建设耗费异常巨大，以致杰罗姆(Jerome)声称“君士坦丁堡的落成是通过把几乎所有其他城市压榨剥削殆尽而实现的”。参见Philostorgius, *Church History*, appendix 7. 7c and 8b, p. 209。左西莫斯则责备君士坦丁一世把“公众财富浪费在大多数都是无用的建筑之上，因为他修建的一些建筑由于工期过短而成为危房，不得不在建成后不久就予以拆除”。参见Zosimus, *New History*, 2. 32. 1, p. 38。非基督徒史家尤纳匹乌斯或许不无偏见地抱怨，“君士坦丁把所有城市都掏空了，向拜占庭城运去各地的无数居民居住在他身边，因为他喜爱在剧场中听到这些醉汉的鼓掌喝彩”。参见Eunapius, *Lives of Philosophers*, trans. by Wilmer Cave Wrigh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83; Jonathan Harris, *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Byzantium*, p. 26;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堡大帝时代》，第286页。由此，“君士坦丁堡的规模不断扩大直至成为最大的城市，皇帝们先后相继地居住在这里，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大量过多的人，包括士兵、官员、商人以及其他职业的人”。参见Zosimus, *New History*, 2. 35. 1, p. 39。研究者认为，在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堡的定居人口约为9万，到4世纪后半叶君士坦丁堡居民总数已经达到20万至30万之间，至5世纪中叶，人口可能已经增加至50万。参见Jonathan Harris, *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Byzantium*, p. 29。作为宫廷所在地，君士坦丁堡可以从帝国其他地区得到充分的供应，尤纳匹乌斯声称从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与腓尼基搜刮来的所有谷物都用来供应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参见Eunapius, *Lives of Philosophers*, p. 383; Jonathan Harris, *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Byzantium*, p. 26。至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每年从埃及运往君士坦丁堡的谷物大约可以供养60万人口。参见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 I, p. 698。为

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也就会不断上升直至赶上和超过了旧都罗马。但是,与此同时,虽然皇帝离开罗马造成罗马政治地位的相对下降,但是作为旧都,罗马仍然保有传统赋予它的特殊地位。因此,随着君士坦丁堡地位的上升,帝国在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具有相等地位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名实相符的首都,自公元330年之后,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首都,当帝国统一于一个皇帝之下时,更是整个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心;罗马则自君士坦丁堡落成后,虽然依然保持着帝国首都的名分与特权,但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首都,甚至西部地区的皇帝们也基本放弃了罗马,而罗马则只能期待皇帝们的来访。于是,帝国的东部地区得以凭借君士坦丁堡这一新的中心城市在政治上与西部形成并立之势,君士坦丁堡也最终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的首都。

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新都自然不能排除统治者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本质上是根源于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逻辑,而该城落成之后,由于它成为东部皇帝的固定驻地,来自于帝国各地的资源长期而大量的倾注于其中,最终使其成为地中海世界东部的政治中心,开启了日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篇章。但是,也正是由于地中海世界东部出现了君士坦丁堡这样一个新的帝国中心,从而不仅加速了罗马城实际地位的相对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4世纪前期—5世纪中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东部皇帝的目光更加集中于其统治基础所在的东部地区,而对西部地区

事务的兴趣则有所下降,¹由此加速帝国东西两部的分道扬镳,成为地中海世界东部和西部地区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诱因之一。

[作者董晓佳(1977年—),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1]

[收稿日期:2014年9月30日]

(责任编辑:徐家玲)

保障首都食物供应时,帝国会特别拨款给负责官员以便及时购买粮食:比如,帝国于409年下令拨出500磅黄金,由君士坦丁堡市政官购买谷物以备饥荒(Clyde Pharr [tran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14. 16. 1, p. 417.); 434年,为了相同的目的,又专门拨出611磅黄金,并且严禁挪用(Clyde Pharr [tran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14. 16. 3, p. 417)。

¹ 4世纪前期—5世纪中期之间,君士坦丁一世之后东部地区在位时间最长的3位皇帝塞奥多西二世(在位42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位24年)、塞奥多西一世(在位16年)绝大部分时间均居住于东部地区,除非西部皇帝为僭位者所杀(383年的格拉提安、392年的瓦伦提尼安二世)、死后无子(423年的霍诺留)而出现自立为帝者、或是与东部皇帝失和(361年的朱利安),否则东部皇帝基本不会插手西部事务。此后,西罗马军队将领奥多阿克(Odoacar)废黜西罗马末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努斯(Romulus Augustulus, 475—476年在位)后,东部皇帝泽诺(Zeno, 474—491年在位)对此予以默认(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 p. 407),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当时泽诺正忙于稳定自己在东部地区的统治,以致分身乏术(其时,东部地区内乱,泽诺的皇位在476年刚刚失而复得,地位仍然不稳,宫廷斗争激烈。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帝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79页)。